

第一章 长征开始之前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长征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中国革命当时条件下的国情、党情、军情和敌情。一句话，就是必须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辉煌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忍受残酷的压迫剥削，纷纷起来反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1919年爆发了具有伟大意义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立即推动着中国革命蓬勃向前发展。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把大批共产党人投入血泊之中，使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①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随后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道路。同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震动了全国。在党的“八七会议”的号召下,在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的影响下,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纷纷举行武装起义。从1927年秋到1929年年底,全国大小武装起义100多次,在斗争的烈火中建立了一批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并先后在江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安徽、河南、陕西等省的300多个县,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北等10余块革命根据地。1930年,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之众,革命形势十分喜人。

井冈山斗争的星星之火熊熊燃烧,革命的力量迅猛发展,深刻地震撼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从红军和革命游击队诞生的第一天起,敌人就开始对它进行疯狂的“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样,“围剿”和反“围剿”,就成了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要粉碎敌人的“围剿”,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则是制定正确战略战术的根据。毛泽东最早正确认识并指出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些根本特点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用以指导反“围剿”战争,因而总是稳操胜券。实践证明,用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战略战术原则指导战争,必胜;反之,必败。

1930年6月开始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曾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当年9月,党中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这就为以后各根据地的红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从1930年年底到1931年7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连续向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反革命“围剿”。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领导

下,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30年年底开始的第一次反“围剿”,4万红军5天打两仗,歼敌1.3万人,缴枪1.3万余支,粉碎了敌人10万大军的“围剿”。1931年4月,敌人以20万重兵开始了第二次“围剿”。3万余红军在半个月内存打5仗,五战五捷,向东横扫350公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3万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以近3个月时间,乘机乘隙歼敌,共击溃敌人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蒋介石哀叹:“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①

彭德怀对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作了崇高的评价,他在总结第三次反“围剿”时说:“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②

实践出真知。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以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③,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形成了。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红军必须实行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战争;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对强敌的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上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平分兵力,全线抵御,主张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等。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

①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地图选》第11页,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彭德怀自述》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验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向全党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他们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并且全盘否定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把他们的错误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中来。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30余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时“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尚未得到全面贯彻,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中大见成效的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指挥作战,经1个多月的战斗,歼敌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悲哀地承认:“唯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在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后也写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①等语,足见红军的胜利,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蒋介石组织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仍贼心不死,立即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的组织准备工作。他向各帝国主义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和大批军火;他聘请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参与拟定“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他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聘请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分批对他的军官实行法西斯的军事、政治训练。在作战方针上,蒋介石总结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战略战术。

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部署是: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指挥

^①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33个师零3个旅和1个税警团,担任主攻任务;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9个师零3个旅;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11个师零1个旅;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指挥蔡廷锴的3个师。这次“围剿”,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打法,采取了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达到蚕食苏区,逐步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最后寻找我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敌人发动的这次“围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形势是严重的。但是,只要作战指挥方针对头,粉碎这次“围剿”也是可能的。当时的有利条件是:中央根据地空前扩大;中央红军的力量有很大发展,不仅有正规红军近10万人,还有近20万人的赤卫队,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根据地军民取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广大军民斗志昂扬,已做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

可是,中央红军这次反“围剿”,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在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所以,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临时中央和李德进入苏区

1933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了,不得不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贯彻“左”倾路线,排斥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抓紧时间,首先于2月间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党的政策应从实际出发,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遭到残酷斗争和打击。接着,他们又指责执行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当时是中共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谢、古都是党和红军的重要干部)四人为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等帽子,也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打击。这样一来,中央根据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进入中央根据地。李德又名华夫,他的真实姓名是奥托·布劳恩,生于1900年。1919年,参加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1926年被捕,

1928年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32年春,他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同年秋天,共产国际派他到上海担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他与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相结合,军事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是尖锐地提了出来”^①。在建军问题上,他们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在政治工作中,发展形式主义。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懂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否认敌强我弱的现实。只知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实行击溃战,消耗战,反对歼灭战;实行分兵把守,反对集中兵力;实行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进攻时搞冒险主义,防御时搞保守主义,转移时搞逃跑主义。

李德的“独立房子”

1932年秋天,博古在上海工作时就结识了李德,并得知他要到中央根据地担任军事顾问的消息。因此,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博古就下令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单独修建了一座面积约有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大家称它为“独立房子”。李德到苏区后,就住在这座房子里。党中央派伍修权和王智涛两位同志给他当翻译。当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对李德的生活照顾是有求必应,非常优厚。他穿的是优质灰色斜纹布料,吃的是特殊伙食。李德喜欢吃面包,瑞金没麦子,就到外地去买面粉;厨师不会烤面包,就精心做成烤肉饼。李德爱吃烤鸭,没烤炉,就用酱油卤成红烧鸡代替。李德烟瘾大,一天要抽三包“哈德门”一类的高级烟,苏区没好烟,总司令部第六局和总供给部只好派专人通过私商到白区去买;有时前方打了胜仗,还发专电给部队令其收缴高级香烟。身边的工作人员为李德

^① 《六大以来》(上)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的生活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还不满意，常常大动肝火，把别人训得无所适从。李德一副家长式的架势，高人一等的官老爷作风，同红军当时在政治上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建军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李德到苏区的时候，正是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李德是百分之百地信任，言听计从，坚决照办。李德名义上是顾问，实际上独揽了对红军的指挥大权。李德刚到中央苏区时，博古等向他介绍过一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他在军委作战局听取过一次当前敌我态势的汇报。此后，从1933年11月开始，军委作战部门就围绕着李德的指挥棒转。党中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组织指挥，实际上是根本不懂得军事的博古通过所谓的外国“智囊”李德，实施对军委和全国红军发号施令的。李德常常是收到敌我态势报告后，没作认真的实地调查，就凭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得的书本知识，进行教条式的瞎指挥。他用所谓的“正规程式”，下达指示和命令，指挥作战。他的所谓正规作战指挥程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付蒋介石的“围剿”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对敌人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要“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

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步步向中央苏区进逼，以便达到他们“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之目的。李德为了“两个拳头打人”，把历来协同作战的红一、三军团分开，西起赣中的永丰，东至闽西，一齐出击。战斗失利后，又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们二三百米远时，命令部队向敌短促快速突击。一打，敌人进碉堡去了，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李德不听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不顾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事实，一味靠图上作业，用电报调动红军，下令部队拼死进攻。

当时任红军总部作战科参谋的吕黎平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李德的所谓“正规化”打法，我是亲身领教过了的。“在瑞金，每当他接到敌我态势的电报以后，就围着他房子的大地图绕着圈子，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冥思苦想，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用尺子比量着，然后就口述他的意图，让伍修权同志起草电文，之后速转给中央军委副主

席周恩来，由他向军委的朱德、刘伯承等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等签署下达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哨兵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一个碉堡配置在什么地方，这些细节他都作了规定，然后在电话里（当时通讯相当落后，电话时通时断）通知部队按地图标定。当时我们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较大，没有实测过，有的连地名方向都不准。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给部队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心中无数，手忙脚乱，结果贻误许多战机。”^①周恩来对李德的“地图指挥”十分恼火，有时对博古等人说，不能全听李德的，要在一定范围内，给部队指挥员必要的机动权。但博古等人听不进去，只相信李德一人，结果仗越打越坏。军委首长和总司令部无能为力，只得在业务职能之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以减少根据地和红军的损失。

李德很少到前线去作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他偶尔去一次，也是“蜻蜓点水”。他到前线，不是去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按照实际情况修改作战计划，而是检查他在“独立房子”想出来的“正规化”打法，在前线真正落实了没有。因此，他去前线一次，部队倒霉一次。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去阵地视察，看到有一个山头上修了一个孤零零的碉堡，显然是会被动挨打的，他指示部队在河边隐蔽处构筑了工事，以利火力支援和掩护。工事刚修好，李德来了，一看他画的地图上没有这个工事，就责问和训斥：“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当即命令把工事毁了，还撤了唐天际的职务。实战结果，敌人一炮就把碉堡给毁掉了，坚守的红军战士全部伤亡。事后，一些战士都在议论李德是瞎指挥。又有一次，李德去前线视察，总政武装动员部部长罗荣桓也随他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不知发现了什么，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命令罗荣桓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地雷回来向他报告后，不一会儿，他又变卦了，又命令罗荣桓再带工兵排把地雷起掉。但时间来不及了，敌人已接近了埋雷区，不能让战士们作无谓的牺牲，罗荣桓没有理睬李德。李德见此情景，暴跳如雷，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此时，敌人已踩响地雷，炮弹也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了，他见势不妙，拔腿就走，此事才算了结。

^①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142～1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

这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引起军委领导同志和各军团的多数负责人对李德的不满,大家抵触情绪都很大。但博古十分器重李德,因此李德不但不采纳正确的建议,还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甚至罗织罪名,进行残酷迫害。黎川失守,李德把责任归罪于萧劲光,撤了他红七军团政委的职务;周恩来谨慎从事,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理反驳,才使李德加害萧劲光的主张未能得逞。总参谋长刘伯承也因对李德有不满情绪,长征开始前就被排斥到五军团当参谋长。

李德对红军高级干部是如此蛮横,对下面的同志更是简单粗暴。1934年9月,红军大学有个军事教官,名叫陈时骥,是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五十九师师长。李德去红军大学讲授战术课时,陈时骥听后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另外,他对红军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不满。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都写进了日记里。不久,陈的日记被人发现。李德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陈时骥。吕黎平说:“那时,正是红军准备撤离中央根据地,‘清理’内部,推行过火斗争时期,李德趁此机会,向中央军委提议并亲手把陈时骥枪毙了。这件事我记忆犹新。”^①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掩盖事实,说什么“不久以后他失踪了,可能被枪毙了”。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鬼话。

在这个时期,由于我们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才使李德的“独立房子”成了红军的最高指挥中心。瞎指挥给红军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大家怨声载道。但是,我们党政军的负责同志,还是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他们顾全大局,坚持团结,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军委总司令部与一方面军司令部合并后,一次,朱德对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说,李德顾问不下去调查,靠看地图、电报指挥,问题不少,“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还告诉大家:“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这次反‘围剿’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听了朱德的一席话,大家思索着其中的道理,坚定了革命信心。

^①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

“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的领导下,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因此,蒋介石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部分兵力东去镇压十九路军,对中央根据地暂时采取守势。这是一个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过的。”^①这时,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②。这样,就将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力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领导者拒绝了这个正确的建议。他们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的领袖们和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拒绝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援助。反而将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敌人的堡垒线,使良机坐失。结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③。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全会主观盲目地提出中国当时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等。继

①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政策。这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就把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引向了邪路，失去了正确方向。

广昌“正规战”破产

蒋介石在1934年1月迅速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之后，立即重新调兵进攻中央根据地，使根据地陷入更加严重的局面。

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之后，一变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单纯防御。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红军屡战屡败。

4月初，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占领闽西北后，即向广昌正面围攻。广昌，位于闽赣交界的赣东南方向，是中央根据地北部的门户，是两军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门户一开，堂奥难保。”蒋介石就是想从北路首先突破，占领广昌，打开缺口，然后各路军协力合击中央根据地的腹地。敌人的战略企图，通过侦察已经判明：旨在找我主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还命令我一、三、五军团“开赴广昌”，准备迎战。他命令在广昌城周围构筑三道坚固的防线，加固所有阵地。部署是：五军团的十四师，坚守正面，先储备三个月的粮食和弹药；三军团集结在城西侧翼；一军团集结在城东北。任务是：准备“死守广昌”。李德为了贯彻他坚守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意图，建议党中央的博古、洛甫和军委的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组成中央军委北线总指挥部，率军委指挥班子赴广昌前线，直接指挥这一“决战”。李德这一“地图作业”方案的建议，军委没有讨论，也没征求作战部队领导同志的意见，可博古十分赏识，立即表示赞同和批准了。

我军的这一战役意图和兵力部署情况，敌人很快侦悉了。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是他多年来处心积虑梦想消灭我中央红军主力而求之不得的。蒋介石立即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纠集11个师的兵力，由北南下，以其十一师、十四师等精锐为前锋。同时，还把从德国购买的大炮、轻重机枪、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调往前线部队使用；并派从德国请来的军事顾问西克特去陈诚的前敌总指挥部，协同指挥空、地、炮联合作战。

这次广昌战役，实质上是两个德国人在指挥作战，敌我双方的其他

人员都是陪衬。双方都是搞“正规化”作战。西克特按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指挥蒋军，李德按苏联军队的战斗条令指挥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历来反对的一场“乞丐向龙王比宝”式的消耗战，就这样开始了。

4月10日，决战开始。敌人首先以飞机、山炮对我阵地轮番实施雨点般的轰炸、轰击。我红军未出击，就死伤了好几百人，红军战士躲在残存的工事里尽挨打。敌炮火向红军阵地纵深延伸后，蒋军凭借人多势众，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的掩护，以密集的“羊群战术”向我阵地反复冲锋。双方进行了一场恶战。敌人是在将近5公里的正面，采取营方阵的集团冲锋，全线攻击；我军是全线防御，全线反冲锋。激战一天，敌我双方损失都很大。兵员的迅速减少，对于兵力雄厚的敌人来说，影响不大；可对弱小的红军来说，形势就不同了。我前线指挥部常得到这样的消息：有些连队早上进入阵地时是100多人，晚上加连部勤杂人员算上也只有20多人了；许多部队把司、政、后机关工作人员都拉上去了；弹药也越来越少了，等等。红军阵地上的火力明显有所减弱。但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英勇顽强的。敌人冲到跟前了，就端着刺刀与敌人肉搏，有的刺刀拼弯了，一脚踩直，继续战斗。这样的激烈争夺战，在红军的第一道防线——广昌北大门的甘竹附近，整整坚持了5天。

4月14日，敌人主力攻占了甘竹附近的许多山头。红一、三军团及红九军团的一部分想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激战一夜，没有奏效。此时，军委北线总指挥部知道第一道防线已被突破，只好下令部队撤至广昌城北约7公里的长生桥一线阻击敌人。这里是中间一条河，河两岸是丘陵山地，地域不太开阔。在这个7公里的狭长地带，红军与敌人激战了10天，打的纯粹是消耗战。红军的伤亡人数和弹药消耗一天天增大。结果，长生桥一线又被敌人占领了。面对现实，按常理说来，总得放弃原来计划，实行大踏步的战略退却了吧。可是，李德等人还是一再下令部队“死守广昌”，“寸土必争”。接着，李德又把红军第十三师部署在广昌城东部一带继续抗敌，令红一、三军团在城西部一带设防，红十四师在广昌城内坚守，准备再次与敌人展开大决战。

4月26日，敌人以两路纵队，步步进逼，企图夹击固守广昌城的红军。27日，敌人已完成了包围夹击部署。28日，敌在广昌城的第一线集结10多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发起总攻。激战一天，傍晚，敌罗卓英部3个师占领了广昌城。

敌人占领广昌县城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整个“围剿”的战略部署改为兵分六路，目标直指中央根据地的中心——瑞金。在近3个月内，敌人是小心谨慎的，缓慢推进，步步为营。7月，李德等人又决定在广昌县境内的头坡、贯桥、大寨垸、高虎垸一带布防，阻击敌人。李德三令五申地要求部队修筑坚固工事，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死守阵地。7月24日这一天，战斗打得异常艰难残酷。当敌人发起第二次进攻时，我红军战士的阵地前沿，除了没被敌人踩响的地雷外，什么掩体、交通沟、战壕，统统被敌人的炮火摧毁得残存无几了，弹药也差不多打光了，手中的武器只有刺刀、滚石、擂木等，部队伤亡很大。红五师十三团一营，趁敌人炮火转移时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自己一个营原来数百人，现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干部战士们对这种“正规战”厌恶极了，都说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就是这样，李德还要军委总部向各部队打电话，命令部队“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指战员们只好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脚踢，最后抱住敌人一同滚下悬崖。8月27日，进行广昌大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这一天，敌人共突破了红军的三道防线，前进5公里。广昌大会战的结果，红军仅俘敌130余人，而自己却伤亡了5600人，损失惨重。8月底，红军被迫全部撤出广昌县境。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和根据地陷入绝境。此时，毛泽东以宽广的革命胸怀，远大的战略眼光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看到当时红军主力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湖南方向实行战略进攻，因此，他建议红军“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①。但是，“左”倾领导者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②。至10月上旬，敌人先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已经势在必行了。

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聂荣臻有段科学的论断，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制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的必然结果。”^①

二、秘而不宣的意图

广昌战役失利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人的地、空、炮联合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回到瑞金后，就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大转移，准备同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5月，他们就在上层秘密地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这次战略转移，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转移”、“长途行军”、“远征”、“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跑那么远的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陕北去。因此，一切准备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大搬家”上。

少数人的密谋

长征，是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的，但是准备是不充分的，而且存在严重错误。

首先，长征这样战略转移的大事，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秦邦宪 1943 年 11 月 13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②张闻天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③

其次，优柔寡断，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方针。在广昌战役中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各路敌军逼近苏区中心，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极少胜利可能时，红军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去作战，寻求有利战机，打击敌人，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并且，共产国际于 1934 年 6 月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198 页，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 103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博，博古；李，李德；周，周恩来。

^③ 《遵义会议文献》第 78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25日也来了一个正确的电报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①“左”倾领导者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和共产国际指示及时转变战略方针，一方面认为需要突围转移，另一方面却企图用一切力量来捍卫中区，企图以发展游击战争，争取战役上大的胜利来改变战局。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强大的敌人继续拼消耗。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②这种一方面准备突围，另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变关头优柔寡断、惊慌失措的表现，是长征准备工作中战略指导上的严重错误。

再次，“左”倾领导者片面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③。因此，这样巨大的转变，“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④。甚至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当时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意图。

“左”倾领导者对红军内部实行严格的保密，但是对敌人却没有保

① 《遵义会议文献》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17～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③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0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出版。

④ 《遵义会议文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住密,蒋介石早已知道了我军的突围意图。其北路军总指挥薛岳于1934年10月18日的电报中指出:“奉委座(蒋介石)谕(20日)①辰参电,据说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②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蒋介石很可能……知道了我们的突围意图……从很多情况来看,蒋介石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基本决定的情报。”③蒋介石并为防止我军突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苏区周围抓紧修建碉堡,布置封锁线,加紧向苏区中心发动进攻,力图把红军消灭在苏区之内。

长征准备工作中的另一严重错误,是军事上的准备非常不够。主力红军要从有苏区作依托的内线行军作战转到离开苏区的外线行军作战,从短促突击和阵地战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区的运动战,从发动与依靠苏区群众的参战积极性转到赤化广大国民党区域,发展新苏区,要实现这样的重大战略转变,在军事上是必须进行充分准备的,但是“左”倾领导者却没有这样做:“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拼,应保守实力,仍拼(高虎埭、万年亭、驿前战斗)”④;“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⑤;战略战术思想应从过去打堡垒战阵地战转到打运动战上来,应对指战员进行运动战和长途行军的临战训练,特别对新兵进行必需的军事训练,未做。正像刘伯承指出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⑥

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了,敌人即将进入苏区中心了,形势剧变,严重的任务摆在苏区党政军民面前: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把留下的红军坚决分散,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也应该改变过去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就是说,应实行从阵地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蔽斗争这样的转变,保存力量,长期坚持,准备条件,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但是,“左”倾领导者对于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后如何坚持斗争,没有研究,没有准备,没有布置。正如

① 指1934年9月20日。

②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台湾出版。

③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08页。

④ 刘伯承:《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遵义会议文献》第91页。

⑤ 刘伯承:《回顾长征》。

陈毅讲的：“左”倾领导者退出中央苏区时，“这个退出，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同志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①。

长征准备工作中的这些严重错误，导致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也导致苏区继续遭到严重损失。

长征前进行的准备工作主要的有下面一些。

第一，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5月至9月，扩大红军近10万人，新成立了红二十一师、红三十四师、教导师等部队。7、8、9三个月为扩大红军1倍的冲锋季活动；9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9月21日，成立以周昆为军团长、黄苏为政治委员的红八军团。不少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了主力军。

第二，决定干部走留。高级干部的走留，一律由博古决定，博古自己说：“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②党中央、政府、共青团、总工会等各部门的干部，则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经博古批准。部队人员由总政治部决定。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局）部（局）长的李维汉说：“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③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④

第三，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留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任主任。10月22日又成立了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与坚持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与斗争。同时还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

①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2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② 秦邦宪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③ 中央组织部，也叫中央组织局。

④ 李维汉：《回忆长征》。